

山东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理论与实践

朱兰芝 主编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理论与实践/朱兰芝主编.——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0.3

ISBN7-80629-520-8

I. 毛…

Ⅱ. 朱…

Ⅲ. ①毛泽东思想—廉政建设—研究②邓小平理论—廉政建设—研究

Ⅳ. A8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285 号

责任编辑:刘元锋

封面设计:侯文英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刷

(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588 号)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3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8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导论:反腐败——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1)
一、腐败——一种消极的社会历史现象	(3)
二、腐败的根源	(6)
三、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	(15)
四、共产党人的反腐败斗争	(19)
五、毛泽东、邓小平的反腐败理论与实践	(24)
第一章 毛泽东反腐败理论产生的条件	(28)
一、社会历史条件	(29)
二、思想理论前提	(36)
三、主观条件	(58)
第二章 毛泽东反腐败理论的萌芽和形成	(79)
一、毛泽东反腐败理论的萌芽(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79)
二、毛泽东反腐败理论的形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	(98)
第三章 毛泽东反腐败理论的成熟和发展	(130)
一、毛泽东反腐败理论的成熟(建国初期到 50 年代中期反右派运动之前)	(132)
二、毛泽东反腐败理论在曲折中发展(从 50 年代中期反右派运动开始至毛泽东逝世)	(189)

三、结论	(210)
第四章 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形成	(223)
一、初步提出阶段	(224)
二、重要发展阶段	(232)
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阶段	(246)
第五章 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主要内容	(276)
一、反腐败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276)
二、新时期腐败现象的表现、危害及产生的原因	(295)
三、反腐败斗争的方针、目标和方法	(322)
第六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 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365)
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严峻现实	(366)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败 理论的贡献	(378)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 ...	(389)
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必由之路	(399)

导 论

反腐败——

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当今之世，就像癌症、艾滋病作为顽病严重地侵害着人们的肌体一样，腐败已作为灾难性的时弊侵害着人类社会的肌体，于是反腐败斗争就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关注的大问题。美国的白水事件，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克拉克贪污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之子贪污案，韩国总统全斗焕、卢泰愚收受贿赂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案……无不使国民震惊、世人瞩目。从这些被揭露的案例看，无论是大国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腐败这一瘟疫都无一幸免。照一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解释，那些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有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也就罢了，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在那些以消灭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切

弊端，建立光明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为己任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其腐败程度并不亚于一些资产阶级国家，以至还因它的领导者的腐败而一朝覆亡。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因为自己的腐败而葬送了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典型。

这使我们回忆起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老祖宗”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那一段有名的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有诸多打着这种共产主义革命旗号的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了由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和由它造成的那些陈旧腐败的观念，从而使自己的腐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结果是，百年奋斗，一朝覆亡。列宁领导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最终垮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敌对力量增长的结果，而应该认识到它是这个政权自身腐败、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

同时，这也不能不使我们回忆起毛泽东。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救治那个在腐败无能的剥削阶级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而在他带领中国人民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并行将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的时候，他又预见了新政权可能滋生腐败的危险性。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巨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②直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晚年，他还在不无忧虑地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但是，无庸讳言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自身内的腐败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成败安危以至生死存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为此曾多次发表谈话，以至慷慨陈词，足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忧虑。但是，彻底反腐败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放在思想防范、教育上，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对待的现实问题。

一、腐败——一种消极的社会历史现象

腐败是通过个人、集团、阶级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的，它的表现形式真是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卖官鬻爵、行贿受贿、侵吞贪污、腐化堕落、结党营私、官官相为、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以至杀人谋权、践民掠财……。尽管腐败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表现程度轻重不一，但是，具体内容是一致的。概括起来说，它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上的腐败。一个社会制度创建伊始，无论是在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上，还是在代表的现实经济关系和利益上，一般都是进步的，对历史的进程起推动作用的。但是，当它树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基础赖以确立的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而它本身需要作某种调整和革新的时候，实际上那些得益于旧制度的人物和阶级、阶层就会继续维护和利用旧制度并因而破坏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这些人物、阶级和阶层在历史上的作用来看，他们就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而他们自身就成为腐败的人物、阶级和阶层。周王朝后期，那种与奴隶制相适应的分封制已经发展到极端，这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必然起来推翻它而它自身的腐败又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所谓“礼崩乐

坏”，是礼自崩、乐自坏，它是制度自身腐败的结果。

政治制度的腐败是与它赖以确立的现实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突破现行经济关系的时候，变更现行的经济关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旧的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旧制度也就应当遭到破坏。但是，由于建立和依赖旧制度的那个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腐败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必须继续利用旧制度，把旧制度作为它的避难所，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个阶级、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腐败就表现于制度的腐败。

二是吏治的腐败。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吏治腐败一般又称用人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在阶级社会中，当一个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它直接面对着敌对力量的攻击，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维护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地位，它必然要按照本阶级的用人标准和要求选拔能为巩固它的统治地位、建立它的统治秩序效力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个别的受旧营垒政治影响较深的人物以外，这个阶级的政治家一般都会力求打破陈规，招贤任能。但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走完了它的鼎盛阶段以后，它就趋于保守，表现在用人上，有权者就沾亲带故，互相勾结、互相提携，以致如古人所云“萧朱结带，王恭相贺”；而那些无权者又非亲非故的，就只能投机钻营，攀高结贵，于是投靠奔竞之风炽，卖官鬻爵之行多。如战国时期楚国政治昏暗腐败，多有奸谗小人干政之事。屈原就发出了“腥臊并御兮，芳不得薄”的感慨。楚贵族用人的腐败最终导致了楚国的灭亡。屈原作《离骚》，看似抒放逐之忧愤，而实际上是寄寓了他对心爱的楚国贵族政权行将灭亡的哀叹。

三是经济行为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于侵吞、掠夺、行受贿赂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最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思想、行为方式，最终都会集

中表现于经济行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所有制关系主要是私有制,所以,与此相联系的私有观念就成为一种主导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只不过是有一个阶级刚刚兴起以至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它的经济目标作为一个进步的阶级的根本发展目标和利益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因而这个阶级仍在积极奋斗、进取,这时候它的行为常常表现为“公”而不是为私,但这个阶级的“公”实际上是以它赖以确立的特定的私有制形式为前提的。即使如孔夫子、孙中山这样以全社会为己任的政治家、思想家也莫能外,他们之为“公”也是为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公”,而非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当代表这样的新兴生产关系的阶级利益之“公”实现后,这个阶级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逐渐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其经济行为的表现就是与此相联系的侵吞和占有。

四是思想文化道德上的腐败。当一个阶级趋于没落时,作为其经济关系、进而上层建筑表现的思想文化道德也必然走向腐败。早先它为之信誓旦旦的那些东西已经成为过去,因而这种信誓旦旦已只不过是空头说教,而实质上到处都在以其否定的形式出现,它作为思想文化道德的腐败就会逐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例如,封建统治阶级的遗老遗少们大肆宣传的男女有别、男女之大妨、男女授受不亲,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伪装,而实际上是男盗女娼的挡箭牌。《红楼梦》中所写贾府的焦大骂贾府“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就活画了封建主义伦理纲常在它的末世彻底崩贵的现实。

腐败具有明显的历史形态性,也就是,它具有它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特点。例如,奴隶制社会的腐败表现为礼崩乐坏、仁政中断,而周天子以及其他一些诸侯国国君仍以礼乐仁治国,实则苟安于乱世;封建社会,腐败多表现为卖官鬻爵,利用特权贪污占有、荒淫无度、鱼肉百姓等;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政治上贿选,经济上对金钱的占有欲,如收受贿赂、偷税漏税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从封建社会的瓦解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只不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甚为薄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在我国就必然出现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局面。相应地，社会腐败现象就有着不同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腐败的特点。我们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应当充分认识这种独具特色的腐败。

应当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任何腐败，都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统治集团的腐败，虽然它在历史的上升阶段，一般是最坚决的反腐败者。其原因就在于，只有掌握和支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统治者才有可能把腐败推向极致。如果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主要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的话，那么，腐败现象就应当充斥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也许倾向于赞美历史上那些曾经朝气蓬勃的革命阶级而忽视它作为一个阶级的腐败，但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就会发现，那种赞美对那个阶级后期的历史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只不过是一种神圣的谎言。

二、腐败的根源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史，但是，腐败现象也只不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野蛮与无耻的腐败现象恰好发生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而这种腐败现象还在当今的文明社会中历久不衰，甚至以更其顽强的力量存在和发展。世界各国有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的展示，只不过是腐败之严重程度的晴雨表。“我们是有能力治理腐败的！”政治家们这样宣称。但是，他们治理的只不过是失势的或者隐退的政治势力曾经有过的腐败，而不能或者很少治理当下正在发生发展着的腐败，尤其是他们自身作为政治力量的腐败。因此，人们在宣传“我们是有能力治理腐败”的当时和过后看到的是更为严重的腐败。于是，这样的宣言只不过是貌似坚强

而实质软弱的空话。

面对这种现实，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没有找到腐败的根源，而只有正本清源，才可能使水流清正。于是，为腐败寻根求源也就成为反腐败的着力点。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众说纷纭，难以详论。这里略举其要：

一是贪欲论。持这种观点的占相当大的多数。尤其在中国，还因此有许多名言熟语指论贪欲的危害和戒贪的好处：“祸莫大于不知足。”^①“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祸之所赴也。”^②“祸莫大于无足，福莫厚于知止。”^③还因此有戒贪欲的箴言：“知足而不贪，知节而不淫。”^④“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⑤“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⑥但是，这种贪欲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腐败的根源。这里可以从两点说明：一是，通常人们说的贪欲，与疯狂侵吞占有的腐败行为本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在这个意义上，等于说腐败的根源是腐败。二是，贪欲作为一种心理因素是先导因素，而行为构成了腐败，这在直观的意义上说是有其因果联系的，但是，我们考察腐败现象不能只看行为不顾动机。任何腐败都应当包含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两个方面，都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体。因此，探讨腐败的根源就要探讨这样一种思想动机与行为效果相统一的腐败的根源，而不是一般地把思想动机当作根源。

另一种关于腐败的见解认为，是贫穷导致了腐败。其实，这种腐败根源的见解是贪欲论的一种延伸。在持这种见解的论者看来，贫穷、物质财富的匮乏，使人们不能满足起码的生活需求，如果人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葛洪：《抱朴子·嘉遁卷》。

③ 葛洪：《抱朴子·知止》。

④ 林逋：《省心录》。

⑤ 陈基：《次韵吴江道中》。

⑥ 于谦：《入京诗》。

们能够安贫乐道也就罢了,但偏偏有些人经不住物欲的刺激,一味追求,因而才有盗窃、贪污、损公肥私以及行贿受贿等。要解决这类的腐败问题,要么如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或如今天我们所说要“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等,要么就是想办法改变贫困的处境,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但是,持这种见解的论者没有顾及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不仅并不一般地同物质财富的贫困相联系,而且从历史事实看,倒是在物质财富较为丰厚的地方,腐败更为多见。也许有论者说,那是因为贫穷条件下的腐败不会产生惊人的数字而掩盖了其腐败实质,而实际上还是贫穷导致腐败。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腐败现象并不是人们为满足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所作的努力的结果。

与此紧密相联系的是富欲产生腐败论。富欲与腐败的联系,比之于贫穷同腐败的联系当然要多见。富欲,优厚的物质条件,可以为腐败提供更为直接的滋生地,但是,富欲同样使文明进一步发展。管子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在当今世界,贫穷落后国家、欠发达国家比之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比之于发达国家,其腐败的程度毫不逊色,就充分证明了富裕产生腐败论的荒谬。

关于腐败的根源的见解还可举出种种,如权力论、所有制论等。这些观点也是至为荒谬的。其荒谬不仅可以从历史上的各种权力、各种所有制条件下均存在腐败现象、也存在积极进取现象看出,而且尤可从现实中找到相反的证据:当一些人在运用某种权力搞腐败的时候,另一些人在使用这一种权力反腐败;当一种人钻所有制的空子在某一种所有制关系中搞腐败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在维护这一种所有制关系而反腐败。因此,这样的见解也是不成立的。

总括以上种种关于腐败根源的见解可以见出,它们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腐败中的一般现象当成了腐败的

本质,把同一根源的不同腐败现象当成了因果联系,把腐败现象产生的一般前提条件当成了腐败的根源,而在治理腐败的方法上也就治表不治本甚至会愈治愈腐。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说,把腐败的思想和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个人的生理心理本性和偶然的或者特殊的动机的观点,把一般腐败现象的表面联系当作腐败根源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只有把腐败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腐败这一概念来看,它是指社会和国家统治阶层背离全社会和整个国家利益而满足某些个人、集团以至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恶性发展起来的奢侈行为。由于人类社会产生统治阶层、组织成为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腐败现象的产生就与这样的历史发展相联系。显然,这个问题应当追溯到私有制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早期和中期,人类的生产能力还相当低下,社会劳动产品极为贫乏。社会组织诸如氏族、部落的成员必须依靠集体的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统治者的腐败。恰如韩非子所言:“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赍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①但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不仅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且还有了剩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氏族、部落权力的首领才有可能侵吞和占有公共劳动的果实,从而产生了原始社会末期的腐败现象。但是,氏族、胞族和部落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伴的部落之间的交往以至联合,必然要求限制和遏止这种侵吞集体财富的腐败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家庭等的

① 韩非子:《五蠹》。

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保护。恩格斯在《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雅典国家的产生作出了中肯的评论。恩格斯说：“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① 毋庸置疑，在早期奴隶制国家中，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是一个朝气蓬勃、颇具进取精神的阶级，而由旧的氏族首领转入新型国家的统治者队伍中的某些人物，也会以其往昔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企图无休止地破坏新型的所有制关系，并与此相联系，也会出现破坏法律和瓦解已经实行的新制度的行为。这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著作中均有论及。例如，恩格斯就指出：“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 509 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② 也就是说，腐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的末期的产物，它与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腐败是代表衰亡着的旧制度、眷恋旧制度的阶级和人物的行为。一方面，是旧制度造就了依赖和眷恋旧制度的阶级和人物，另一方面是这样的阶级和人物又在毁坏着这个旧制度，就像一棵树苗为一只蛀虫提供了生存条件而这一只蛀虫又必然毁掉这棵树苗一样。因此，人们在腐败的阶级和人物那里所能听到的只能是对旧制度的无尽的挽歌，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倚仗旧制度而进行的无谓的攫取。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把腐败的根源归咎于私有制。一个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定要不断滋生着腐败，但是，那些代表私有制关系的阶级在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之初，它本身常常是富有生命力和革命精神的，它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割除附着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5 页。

它身上的旧阶级、旧营垒的毒瘤。例如，新兴奴隶主阶级就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建立了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奴隶主所有制，并进行了消除原始社会氏族、胞族和部落首领政治残余影响的坚决斗争。在这个时候，新兴奴隶主阶级就是革命的、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没落的、腐败的。

同时，与此相联系的贪婪、欲望的膨胀和勃发，也不能一般地认为就是腐败的根源。在研究当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腐败问题时，常有论者把贪婪和欲望说成是腐败的根源。这在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直观的意义上说也是有其正确性的一面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贪婪和欲望当作一般的腐败思想和行为的根源，那就会堕入生理心理本性论的泥淖。诚然，贪婪、欲望常常与腐败现象相联系，在腐败的思想行为中无不表现出极度的贪婪和欲望，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有直接的贪婪和欲望的动机。例如，在人事问题上，搞地方主义、小圈子等，是陈腐的封建宗法制影响的产物，它破坏了党的正常政治生活和纪律，但它并不一定表现为贪婪和欲望。它无疑会有隐藏其后的动机，但这样一种隐藏其后的动机必有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有时候，贪婪和欲望是同积极进取联系在一起的。当年资产阶级兴起之时，就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为它开辟了新的天地，并因而刺激了它对财富的贪婪和欲望，这种贪婪和欲望支持它作新的积极进取以至冒险，并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简括地述及：贪婪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对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它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深刻冲击，它对世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巨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要大。”^① 而此后对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欲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过深刻的分析。例如，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形而上学思想时，就举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制”为例，说明它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欲望使它残酷地使用奴隶，从而为资产阶级创造和积累了财富。“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② 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征引黑格尔后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③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腐败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呢？

首先，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即私有制和私有制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的产物。只有在这一历史阶段，才有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新兴、健康与腐败、没落等。在这样的社会中，既不是全社会的贫困，也不是全社会的富有，而是一部分人贫困，另一部分人富有，因此也就有贫富的差别与对立，有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上层建筑作为保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它是私有制和私有制成分广泛存在的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生产力增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生产关系随之发生更迭，表现为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力量的消长。新兴阶级代表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生产关系,并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已丧失了它昔日的辉煌,前途黯淡,因而也就为追求物欲与感官刺激和享受而不惜损害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官场政治上的腐败,就会对全社会产生严重危害。

其三,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没落阶级思想政治影响的产物。阶级关系的概念是对大量的现实生活的概括的结果,其基础、根据和内涵是财产关系。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单一的在财产关系上由完全对立的阶级构成的社会,而是在其间横亘绵延着一个中间层,因而由财产关系的对立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对立并不能决定整个社会只分成两个绝对对立的阶级,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阶级关系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在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在那些根本对立的阶级中,也还有相互影响、渗透的一面。例如,地主与农民之间有半农民半地主式的富农,而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并没有影响一些农民变成地主。同样,在旧阶级的消亡和新阶级的兴起过程中,新阶级中的人物也可能发生蜕变而在新型的生产关系中搞腐败。尤其这个新兴阶级面对着人数众多、习惯势力雄厚的社会力量时是如此。例如,在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过程中,就有受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政治的影响而发生严重蜕变与腐败的情形。

其四,它是与特定的经济运作机制和社会运作机制相联系的。当一个政权经过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之后,就开始滋生腐败现象。在这种时候,如果能够有效地调适经济运作机制与社会运作机制,那么腐败现象就可能得以遏制,反之,则可能愈演愈烈。元代仁宗年间实行括田,是针对赋税不合理的积弊而采取的措施,但括田者在推行这样一种革除积弊的措施时又借机搜刮民资民财,衍生出新的社会弊端。这些腐败现象,都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